

# 为了永远的怀念：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

##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的四次历险

秦九凤

### 九死一生的飞行

20 世纪的 80 年代初，笔者在淮安县委宣传部工作时接待了一批来自浙江金华的客人。在参观周恩来故居时，金华的客人告诉笔者，他们市有一位市政协委员，曾经在西安事变后给周恩来开过飞机，那次飞行非常危险。笔者当时是搞新闻的，对这一史实很敏感，也很重视，就将客人说的有关信息全部记录下来。客人一走，就用书信联系，终于找到那位当年的飞行员，他的名字叫祝葆卿。他因身体状况不好，已离开金华回到儿子住处长游县。这样，经过前后与祝葆卿十几封信的来往，笔者终于弄清了周恩来那次飞行历险的前后经过。

### 雪地飞马到扶施

周恩来临危受命，时间又特别紧迫。当时的党中央设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张学良派自己专机到扶施（延安）接周恩来。保安到扶施的路程是 85 公里，陕北山高水险，又值隆冬，夜长昼短，扶施城内驻有扶施、安寨和保安三县民团，共有 1500 多人的武装。周恩来去西安，任务重，时间紧，速度要快，只能靠骑马，为了防止土匪、民团的突然袭击，中央警卫团派了一小队骑兵团作为掩护。1936 年 12 月 14 日一早周恩来从保安出发时，朱德将一条俄国产的红色毛毯塞到周恩来的坐骑上。这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鹅毛大雪，只有周恩来那条红毛毯，像一团火焰，随着崎岖的陕北山路一闪一灼。当天只走了 40 公里，天黑时不能冒险夜行，周恩来在安塞县城西边的一个小村子土窑洞里过了一夜，15 日早饭后继续向南行军，一直到下午 5 点左右，才马不停蹄地赶到扶施城北门外的蓝家坪。



周恩来乘坐的祝葆卿（左一）驾驶的飞机在延安机场。左三起：博古、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肖劲光

周恩来一行虽然重任在肩，却不能轻易进入扶施城，因为那会很危险。这时，周恩来得知，当天中午曾有一架飞机降落在东郊机场，因为没接着人又飞回去了，究竟何时再来，来不来都是个未知数。这时，周恩来果敢决定：等明天天明，再骑马绕到扶施城到甘泉去，那里驻有东北军，让东北军用车送他去西安。

是夜，雪虽停了，但天气阴沉沉的，寒风刺骨。晚上夜营时，除了周恩来随行警卫人员外，还特意让王春圃（即江华）率领的一支红军游击队起来帮助周恩来宿营地安全保卫工作。

16 日一早，周恩来一行冒着寒风，策马西行。天寒地冻，马蹄不住地在冻地上打滑，人马蹄时都有跌下山涧的危险，所以行进得较慢。当他们绕过扶施城，沿着崎岖的山林，翻越几道山沟，来到杜甫川时，天已近中午了。正焦急间，忽然听到飞机的马达声。周恩来仰天一望，马上反应极快地说：“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来接我的了。”于是，他们下马牵马头，不顾危险，打马急行，很快又赶回到扶施城郊。然而由于民团的阻拦，他们无法直接去东郊机场。于是周恩来就让随行的张子华以“南京派来的与中共谈判的代表”身份，拿着周恩来亲笔写的纸条，由周恩来的副官邱南璋陪同先进城找到扶施县县长高仲谦，让他下令民团不要阻拦。这样，周恩来一行才得以催马赶往东郊机场。这时，驻扶施城内的民团惶恐地喊：“红军冲过来了！”城内外顿时乱了。幸亏随飞机而来的张学良秘书刘鼎（中共地下党员）对高仲谦说：“不准开枪。否则发生问题要你负责！”高仲谦立即命令民团不许开枪。周恩来一行这才从南山绕过去赶到机场。

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多，飞机坐不下，可是到西安事情多，任务重，又不能减少人员，只好让龙飞虎和杨永保两人骑到飞机的行李舱随他去西安。

等周恩来坐上飞机一上天，那位县长就要抓曹山。但民团考虑到红军的威慑，反而不敢动手，好给自己日后留条后路，拒绝不取。但扶施城内人心浮动，草木皆兵，县府“大员”和民团纷纷逃跑。第二天，王春圃率领的那支红军乘势进了扶施城，那是 1936 年的 12 月 17 日。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扶施就改称延安了。

20 世纪的 80 年代初，笔者在淮安县委宣传部工作时接待了一批来自浙江金华的客人。在参观周恩来故居时，金华的客人告诉笔者，他们市有一位市政协委员，曾经在西安事变后给周恩来开过飞机，那次飞行非常危险。笔者当时是搞新闻的，对这一史实很敏感，也很重视，就将客人说的有关信息全部记录下来。客人一走，就用书信联系，终于找到那位当年的飞行员，他的名字叫祝葆卿。他因身体状况不好，已离开金华回到儿子住处长游县。这样，经过前后与祝葆卿十几封信的来往，笔者终于弄清了周恩来那次飞行历险的前后经过。

那是 1937 年 2 月 13 日清晨，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三。周恩来因有重要的事情回延安与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等人当面谈，就请杨虎城写信派一架军用飞机送他回一趟延安。这时，西安上空云层密布，街头细雨蒙蒙，冷风飕飕，大街上行人稀少，一辆辆满载荷枪实弹士兵的汽车呼啸着飞驰而来，又飞驰而去。这时，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七大队第六中队驻西安的飞行员都围坐在机棚里，等候天气晴好，以便接受任务和进行例行的飞行训练。

7 时刚过，在机场担任警卫的祝葆卿，发现一辆黑色小轿车急匆匆地驶来，并在机场门口停车，接着从车上下来三个人。祝葆卿连忙挥手示意，不准前进！其中两位停住了脚步，另一位径直走了过去，在离哨位几十米处站住。祝葆卿抬眼望去，来人穿着一身灰黑色军装，腰间扎着一根宽宽的“武装带”，青青的络腮胡子把他那五官端正的面庞映衬得格外白净。特别是这位军人那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透露着一股英武的气概。那位军人在祝葆卿准许后走到机棚前，彬彬有礼面带微笑地说：“请问你们这里哪一位是领导？”祝葆卿向他打量了一下，见没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就也很有礼貌地回答：“你找他干什么？”

“当然是重要事情。”那人军依然十分和蔼客气。祝葆卿说：“请跟我来。”说完，就把他带往在机棚里值班的副中队长陈又超那里。飞行六中队原来驻在洛阳，蒋介石为督促张学良等“围剿”陕北红军，特意将六中队调到西安，并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中队长金雯率领驻防银川，一部分由副中队长陈又超率领驻防西安。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名义上都已属于张学良、杨虎城指挥。

祝葆卿将人带到陈又超面前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陈副中队长。”来人随即从衣袋中掏出一份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任杨虎城签署的手谕，祝葆卿也凑上去，瞧见上面写着：“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因急事回超延安，请调机一架，即刻护送。”陈又超迅速看完后问：“周恩来将军来了没有？”来人微笑着说：“本人就是。”当时凑过来的飞行员们一见都沉默了下来，因为飞行六中队本来是奉蒋介石之命到西安“剿共”的。西安事变后，名义上这支队伍归抗日联军指挥，实际上仍受老蒋操纵。飞行员一见要送红军领袖周恩来，都感到事关重大，况且当时政治气候多变，这批受反共宣传训练的飞行员都怕惹来祸事，就一个个不声不响地溜走了。

祝葆卿眼见面前这位身着普通士兵服装的人竟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尤其是他那英武的气概，那彬彬有礼的神态，那深邃智慧的双眼……和多年来国民党反共宣传的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便不由地投去敬佩和赞许的目光。当陈又超以天气不好不能飞行为由不想派飞机时，祝葆卿就忍不住问了一句：“陈中队副，让我先上去看看行吗？”陈又超见周恩来将军彬彬有礼，又持有杨虎城将军的手谕，不好

回绝，便点了点头。祝葆卿便从机棚里拿出飞行服穿上，钻进他驾驶的那架美制“安可塞——604 号”飞机机舱，飞机很快呼啸着冲上云霄。当他驾机升到 2000 多米的飞行高度时，只见北方乌云层层，航线上忽明忽暗，就忙降落机场，向陈又超作了如实报告。陈又超面带难色地向周恩来来说：“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飞行，可能有危险。”周恩来从容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用非常信任的目光看着他说：“小伙子，为了团结对外，一致打日本，我们就不能怕危险呀！”他的这一句话重心长的话犹如一块石头投进原本平静的“一潭湖水，震得祝葆卿的心灵整个激荡起来。他 21 岁那年在上海读书时，目睹“一二八”事变时 42 架日本飞机轮番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地区纷纷中弹，而我们中国方面却无力反击，激起了他的一腔爱国义愤，决心跨出校门，投笔从戎。祝葆卿按捺不住地向陈又超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副中队长，既然将军有急事要走，请批准让我带他上去试试。”陈又超犹豫片刻，就一边点头一边嘟囔说：“要小心，如不能穿过乌云层就立即回来。”

“是！”祝葆卿一声响亮的回答后，马上向周恩来点点头，示意跟他一起上飞机。周恩来也连忙向陈又超点点头，表示感谢。

在走向飞机的时候，周恩来亲切地问飞行员：“飞行员，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祝葆卿。是祝枝山的祝，永葆青春的葆，九卿八相的卿。后两个字比较冷僻，所以人们也常用‘宝庆’两个字。”“好，这个名字蛮好嘛。今年多大岁数了？”

“26。”

“啊，好年轻啊。听你口音是南方人吧？”

“我家在浙江汤溪（今金华）。”祝葆卿越回答越机械。

“那好啊，我祖籍是浙江绍兴，咱们还是同乡呢！”周恩来显得很高兴，说到同乡两个字时还轻轻地拍了拍祝葆卿的肩膀。但祝葆卿听周恩来口音却不像是绍兴人，因为到了飞机旁也就没好问。

祝葆卿驾驶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军用飞机，后舱只能坐一个人（投弹手）。周恩来在他的引导下坐进后舱，祝葆卿帮他系好安全带又仔细检查一遍，就向前舱去发动引擎。

飞机呼啸着，很快钻进了云层。祝葆卿深知周恩来肩负重任，就全神贯注地操纵着，想尽量使飞机飞得稳些、稳些，再稳些。飞机穿云破雾，霎时飞到了西安北边的三原县上空。这时乌云遮天，雨也越下越大，机头前茫茫一片。祝葆卿一看继续朝前飞有困难，就转过身来，带着紧张的心情向后舱打了一个前进还是回头的手势，因为前后舱隔着一层玻璃，加之飞机的马达声，说话声音根本听不到。周恩来来了，立即若无其事地微笑着，斩钉截铁地用手朝前指了指，示意继续前进。于是，祝葆卿驾驶着飞机很快又冲到同官县上空。这时雨下得更大了。强风卷着浓密云雨，噼里啪啦地抽打着机身。有时飞机钻入云层中，上下左右一片漆黑；有时雨水狂泻直下，飞机又如一叶小舟在茫茫大海里颠簸摇晃。航线上，什么地貌状况也看不见。当时的“安可塞”型飞机，还没有在云雾中飞行所必需的仪表装置，只能凭感觉和经验来操纵飞机。然而，这种做法也只能维持片刻。在强风暴雨袭击下，飞机终于像一匹不听听话的烈马，失去了平衡。这时，祝葆卿的心也随着飞机的摇摆颠簸得跳个不停，额头上流下了豆粒大的汗珠。突然飞机发动机发出了“昂昂昂”的怪叫声，凭着多次飞行的经验，祝葆卿明白，这是飞机在狂风暴雨袭击下，已经失速下坠，情况危急。他赶忙屏住呼吸，运用特殊情况下的驾驶技巧，强行把飞机往上拉。直到飞机升高改正方向往前平飞，他才不由地长吁了一口气，这时他脸上的汗珠已流过腮帮。他情不自禁地望了望后舱，见周恩来将军仍像没事似的，神态依然是那么安详。这种临危不惧的镇定情绪马上感染了祝葆卿，他紧紧地握住手里的操纵杆，全神贯注地继续往前飞。

不久，又是一股强大的气流从上下冲击下来，飞机又发出“昂昂昂”的怪叫声，机身急剧下坠，祝葆卿连连使出应急的驾驶措施都没能奏效。眼看着将机毁人亡，他就拼命地一面向后舱打手势，一面大声喊叫：“不好，快跳伞！”周恩来坦然地双手一摊，又摇了摇头，表示他不会跳伞，在这生死考验的紧急关头，祝葆卿心想，如果自己跳伞，那么周恩来肯定与飞机同归于尽。在这万分火急的情况下，祝葆卿决定想尽办法摆脱危险，化险为夷。他继续顽强地掌握着操纵杆，几乎是在不可能的绝望中又一次使飞机平飞了。祝葆卿再朝后舱投去一个探询和报平安的目光，周恩来也已觉察到险情太大，便用红铅笔写了个字条从玻璃缝隙间塞了过来。祝葆卿抽出字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祝飞行员师，不要勉强！！不要勉强！！”那惊叹号就像一记记重锤敲打在祝葆卿心上。他摸了摸脸上的汗水，脑袋清醒了许多，也镇静了许多，就连忙果断地拉动操纵杆，减速，低飞，转向……约摸过了两三分种后，大约飞到了同官县的东北角，飞机再一次被狂风暴雨逼得失速下降，跌进了乌云之中。祝葆卿一个劲地拼命抱住操纵杆，尽量让飞机跌得慢一些，伺机再改正平飞。突然，飞机的前边出现了光芒，机身下原野、河川隐隐呈现出来，原来飞机已跌出云层。祝葆卿往两边一看，全是悬崖峭壁，飞机竟跌进了两山相夹的峡谷中，如果随便往哪边偏差一点，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飞机飞出了乌云层，视野明朗了，祝葆卿驾机缓缓地飞出峡谷，脱离了险境，一直绕到洛川上空，航线上云层稀疏多了，但遥望延安依然云雾缭绕。他不便再冒风险飞行，只得绕道远航，降落到西安机场。飞机停稳后，祝葆卿没有立即下飞机，在驾驶座上回想着刚才的险情，不由浑身冒出阵阵冷汗。不料，周恩来一下飞机就抢先一步跑到前边说：“祝飞行员，让你受惊了。”祝葆卿顿时感到一阵温暖，颇带几分歉意地说：“很遗憾，我没送你到延安。”周恩来却像没事似的，指着乌蒙蒙的天空，轻松地扬扬眉毛说：“这不能怪你，是天公不作美嘛。”多年以后，每当祝葆卿回忆起那一次送周恩来去延安时，他都十分感慨地说：“周恩来为国民，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 劳山枪声惊天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周恩来面前又摆着一个新的艰巨任务：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说过“此时则无人能证明周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周恩来的谈判路上是充满各种危险的。

对周恩来这次出行的安全保卫工作，边区保卫处做了周密的部署。他们对沿途情况做了分析，认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已收起反共打内战的破旗，讲了一些团结抗日的話，沿途驻扎的又是东北军和西北军，自然无碍。至于土匪、民团之类，当时正在被清剿之中，他们躲都躲不及，哪还敢搞大的动作？

但是为了有备无患，保卫部还是派了特务队一个加强排前往护送，且计划让 3 辆卡车同行。这样，有情况不但可以互相策应，而且到底哪一辆车是重点，也使外人难以辨认。当时对车辆和人员都进行了监控，随行人员前一天都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唯有加哨看守的 3 辆汽车，引起了有关人员的注意。

车队本来定于 1937 年 4 月 24 日起程的，但由于中共对国共合作新一轮谈判中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敲定，因此决定让两辆卡车先行，留一辆卡车和周恩来等人于第二天起程。周恩来还特意让他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告诉先行的特务队一排队长等人要注意安全。

那天早饭后，毛泽东站在他土窑洞坡地的枣树下，目送着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

山间公路坑坑洼洼，周恩来的汽车像一只小船行驶在大海里，不停地颠簸摇晃。周恩来、陈友才均坐在驾驶室里，周恩来坐最右侧，坐在后车厢里的特务队一排副队长陈国桥和战友们的说笑笑，非常兴奋。“这家中大多数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行军打仗全靠双脚，像今天这样坐着带‘轮子’的汽车进西安古城，平生还是第一遭。”

周恩来的警卫员刘久洲坐在后车厢里，望着路旁飞一般倒着的树木、房舍、田垌，兴奋之余又有几分担心。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他下意识摸摸腰间的手枪：“这家伙跑得这么快，有了情况咋办，能打准吗？”

“颠簸得很厉害，是不好打。”张云逸的警卫员温太林也顾虑重重。

在干部、战士们的说笑声中，卡车飞过了三十里铺，进入劳山山区。山上路窄不平，弯弯曲曲，上上下下，黄土弥天。司机老李加大油门，发动机吃力地吼叫着，一鼓作气进入峭壁耸立的峡谷，而后爬上最高点，越过山脊进入了甘泉县境。

周恩来透过明亮的车窗，看到汽车穿过重叠叠嶂的峡谷，峰回路转地来到一个宽阔的山坳，便和陈友才讲起一个故事：“1935 年 10 月，蒋介石派兵对刚到陕北的红军进行围攻，东北军主力——零师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就是在这里被我红十五军团包围歼灭的……”

“砰！”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打断了周恩来的谈话。

“什么声音？”站在后车厢的陈国桥警惕地问了一句。

“好像是牧羊的鞭子声。”温太林不假思索地回答。

“鞭子？”陈国桥提出疑问，“在这荒山僻岭，根本看不到放羊的，哪来的鞭子响？”

话音未落，“砰砰砰”的机枪声又响了起来。

“是枪声！”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张云逸，马上意识到出现枪响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他警惕地看了看前方、周围环境和卡车所处的位置。

这是一个簸箕形的山坳，山坳谷地是几条山沟的交汇点，中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之为“漱”的深水潭，公路穿潭而过，将潭一分为二。潭左是一大片苇塘，苇塘后边是陡峭的沿漱山。潭右是一片树林，林的后边是一个圆形山包的山坳，山坳的正前方横着一条 300 多米宽 30 多米高的大坝梁。

这时，左侧的峭壁上，左右侧的崖畔间和车头方向，都响起了枪声。周恩来立刻断定他们遭到敌人伏击了。可是，他从全局上判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里不可能有大部队伏击红军，而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事关民族存亡，一刻也不能耽搁。于是他果断地命令司机老李：“冲过去！”

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他将油门一踩到底，卡车吼叫着喷出黑烟，直往前冲去，他希望能甩开敌人。

可是敌人事先已经做了精心准备，他们在土公路上挖了壕堑，卡车往前还没冲出五六米远，右车轮就已陷进沟壕，侧歪在路上，还险些翻了车，老李只好熄火。这时，埋伏在前边不远的坝梁上的敌人开火了，机枪、步枪一齐向卡车射击。车轮被打瘪，驾驶室的挡风玻璃被打得四下飞溅，随着卡车“嘎”的一声停住，司机老李身中数弹，倒在驾驶室上。

“这是敌人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伏击行动。”随着驾驶室右车门自然翻开，周恩来也敏捷地翻滚出驾驶室，对车上的人发出短促的命令，“下车！散开！还击！”

坐在车厢里的张云逸命令陈友才和陈国桥：“陈参谋长，你保护周副主席迅速转移；陈排副，你组织战士进行还击。”

听到命令，干部、战士迅速跳下车枪占有利地形，予以还击。尽管敌人居高临下，用的都是长枪，但他们毫不畏惧，手持短枪顽强地战斗着。

陈友才还没来得及下车，腿部就中了一枪，但他还是忍着疼痛，一面挥舞手臂示意警卫人员掩护周恩来迅速撤离，一面挣扎着爬起来向敌人射击。他头戴礼帽身穿西服挥动手臂的举动，吸引了众多的敌人，子弹密集地向他射来，此刻他也意识到，自己越是能吸引敌人的火力，就越能减少周副主席的危险，于是他巧妙地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做掩护，与敌人展开了周旋。

就在周恩来等人往右撤下公路时，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拖着疼痛的伤腿，不停地向敌人射击。但不久，他就被敌人射来的排枪子弹夺去了生命。陈国桥强压着悲痛，鼓励特务队的战士们：“陈参谋长死得英勇，死得光荣。我们要像他那样，不怕牺牲，坚决顶住，确保周副主席的安全！”

周恩来带领张云逸、孔石泉等人钻进树林，虽然不时噼里啪啦打来一阵冷枪，打死得树叶、草茎乱飞，却不见有敌人追来，他们穿过一个山头，来到另一个山坳，未发现敌人堵截。直到这时，才发现张云逸的手已被子弹擦破皮点，孔石泉衣领右侧被打穿了几个洞。

正行进间，忽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3 人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待临近一看，原来是特务队的战士曹鸿都。曹鸿都向周恩来汇报了敌撤出战斗时的情景，并说他是奉陈国桥之命特意赶来保护首长的。

4 个人转过几个山头，来到劳山西侧。在这里已看不到敌人，但还能听到枪声。周恩来向枪响的方向久久地伫立着，沉默不语。

张云逸说：“看来伏击我们的不像正规部队，可能是一股土匪，估计他们不会追来了，不过也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还是回延安吧！”

他们攀登断崖危壁，险道奇峰，走进一条山沟。突然发现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前边沟掌里有两个两丈多高的土屋，长满了树丛和茅草，密密麻麻的连条羊肠小道都没有，根本无法通过。这时，他们才明白：怪不得敌人在右边没有设伏，因为人在这里无处藏身。周恩来看曹鸿都急得满头大汗，就安慰道：“不要紧张，办法是想出来的。”

曹鸿都突然发现崖上的树梢低垂，离地面不到两丈。他往上一跳，伸手抓住了崖坡上的树枝，一摇一晃，脚在悬崖上蹬了几下，一下跃到了崖上。接着他把绑腿解下来，和其他几个人的绑腿连成一根绳子，将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分别拉到崖上，这才脱险走回了延安。

西安事变后短短 3 个多月，周恩来就先后 4 次遇险、遭袭。可是，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却一往无前，毫不退缩。